

中国回族研究论集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霍维洮

副主任：孙振玉 马宗保

赵 慧 王 锋

主 编：马宗保

副主编：王 锋 赵 慧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宏 马宗保 马春宝

王根明 王 锋 石文典

孙振玉 杨文炯 许宪隆

宋乃平 杨云才 张宗奇

张秉民 周传斌 赵 慧

姚继德 高占福 海正忠

梁向明 霍维洮

目 录

文化·宗教

- 论回族历史上的三次文化自觉 马宗保(3)
- “花儿”与回族民俗文化
- 兼谈“花儿”的族属问题 武宇林(12)
- 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现状分析
- 以宁夏大学为例 马 晴(38)
- 论《古兰经》人性思想的具体内容 马清虎 金 贵(44)
- 刘智著作参阅的阿拉伯文文献 王根明(59)
- 伊斯兰哲学中的天道价值与人道价值 高冬梅(74)

历史·遗迹

- 回族历史和语言研究中的几个议题 李仁安(89)
- 济南南大寺明代石刻《来复铭》并非阐述伊斯兰教教理之文字辨 杨晓春(98)
- 安徽省凤台县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现状 刘晓晨(103)

法律·教育

- 清真食品管理立法的难点及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刘 韬 李自然(121)

宁夏回族经堂教育及阿拉伯语教学的历史渊源与发展	金忠杰(134)
-------------------------------	----------

经济·社会

当前我国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研究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16个县乡(镇)村调查数据研究为例	王 锋(147)
-----------------------------------	----------

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社区人口问题

——甘肃临夏县漠泥沟乡人口现状调查	海正忠(163)
-------------------------	----------

我国回族人口散杂居生存状况与居住环境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	苏东海 王 锋(175)
-------	--------------

宗族、宗教与村民自治

——周康村、北塔村的调查研究	马天龙 马宝龙(187)
----------------------	--------------

“卡力岗”穆斯林族群认同的建构与文化变迁

——德恒隆一村的田野调查	梁莉莉 李启明(199)
--------------------	--------------

传统与现代张力下的回族家庭关系

——吴忠市西湾坊的实证研究	马忠才(208)
---------------------	----------

妇女的组织行动与女性空间的变化

——以郑州北大女寺为例	水镜君 Maria Jaschok(219)
-------------------	------------------------

劳动力转移与回族妇女发展

——以宁夏农村回族社区为例	罗彦莲(234)
---------------------	----------

海外回族华人

从海外华人研究到海外回族华人研究	马建福(243)
------------------------	----------

“石头城”的东干朋友	刘宝军(253)
------------------	----------

文学·艺术

激情、心愿和需求

- 对宁夏回族民间剪纸女艺人井春霞的访谈笔记 赵 慧(263)
- 《先知》与阿博都·巴哈 张宗奇(270)
- 宁夏回族的雕刻艺术 刘 伟(278)
- 沉郁 质朴 深邃
- 论回族诗人马德俊的诗美风格 王 科(290)
- 推动回族舞蹈发展的一些思考 张 涛(301)

其他研究

民族地区普通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对策

- 以宁夏为例 张培松(313)
- 银川市流动人口现状暨对策研究 马志俊(328)
- 流动人口城市化的结构特征及影响
- 以宁夏为例 咸春林 付大巧(339)
- 自来水业民营化改革及其成效的个案研究 王正儒(345)

Contents

Three times of cultural self - consciousness of Hui nationality in the history	
..... (by Dr Ma Zongbao) / 3	
"Huaí" (a kind of folk songs) and folk culture of Hui nationality	
..... (by Dr Wu Yulin) /12	
An analysis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 beliefs	(by Ma Qing)/38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oughts about human nature in the Koran	
..... (by Ma Qinghu, Jin Gui)/44	
Arabic documents consulted with the books by Liu Zhi	(by Wang Genming)/59
The human and natural value in Islamic philosophy	(by Gao Dongmei)/74
Some topics in research to the history and language of Hui nationality	
..... (by Li Ren'an)/89	
Ji'nan southern mosque stone inscription of Laifuming from Ming dynasty not setting forth Islamic doctrine	(by Dr Yang Xiaochun)/98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Islam in Fengtai county, Anhui province	
..... (by Liu Xiaochen)/103	
The difficulties in legislation of Islamic food management and several relations needed to conduct	(by Liu Tao, Dr Li Ziran)/121
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ui nationality mosque education and Arabic teaching	

in Ningxia	(by Jin Zhongjie)/134
An analysis to the condition of relationship among nationalities living scattered	 (by Wang Feng)/147
Population issue at poor communities where minority lives together; an investigation to Monigou, Linxia county, Gansu province	(by Hai Zhengzhong)/163
The living condition and environmental issue of Hui people living together or scattered ...	 (by Su Donghai, Wang Feng)/175
The effect to the villagers autonomy from religion and patriarchal clan of Hui nationality in Ningxia	(by Ma Tianlong, Ma Baolong)/187
The cultural vicissitudes and tribe recognition construction among Moslems in Kaligang area	(by Liang Lili, Li Qiming)/199
Hui nationality family relationship under the tens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by Ma Zhongcai)/208
Female organization action and space change	(by Shui Jingjun, Maria Jaschok)/219
Labor force 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 from Hui nationality	 (by Luo Yanlian)/234
The researches from Chinese overseas to Chinese Hui nationality abroad	 (by Ma Jianfu)/243
The Donggan friends in "Stone City"	(by Liu Baojun)/253
The visits to Jing Chunxia; a folk scissor – cut artist	(by Zhao Hui)/263
"Prophet" and Abdu'l Baha	(by Dr Zhang Zongqi)/270
The artistic carving of Hui nationality in Ningxia	(by Liu Wei)/278
Poem style of Ma Dejun; a poet from Hui people	(by Wang Ke)/290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i nationality dance	(by Zhang Tao)/301

Counter –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eacher forces in ordinary university at minority area	(by Zhang Peisong)/313
A research to the condition and counter – measures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Yinchuan	(by Ma Zhijun)/328
The effect and constru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from floating people	(by Xian Chunlin, Fu Daqiao)/339
A positive analysis to the result of reform in tap water industry from public management to private administration	(by Wang Zhengru)/345

(Translated by Dr Zhang Zongqi)

文化 · 宗教



论回族历史上的三次文化自觉

马宗保

本文从文化自觉的视角对回族历史上经堂教育、汉文译著活动和近代回族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初步分析。作者认为,经堂教育的创建、汉文译著活动的开展以及近代回族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回族历史上的三次文化自觉;回族知识分子历来是文化反思、文化自觉和文化革新实践的主体;回族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自觉都会给回族社会注入新的活力,把回族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回族社会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从理论上正确解答这些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是当代回族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回族的形成、发展史上出现过诸如创办经堂教育、开展汉文译著活动和近代新文化运动等文化革新思潮,每次思潮的兴起都会把回族社会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夫之先生曾经说过:“所贵乎史者,述古以为来者师”。本文试图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对这些重要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新的梳理,以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回族社会文化变迁史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把握回族社会文化的未来。

一、关于“文化自觉”

1997年,费孝通教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

高级研讨班”上作了题为《反思·对话·文化自觉?》的主旨发言。此后,“文化自觉”问题成为人文学术领域的一个鲜活论题。费孝通教授认为:

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①

根据费孝通教授的以上论述,笔者认为:第一,文化自觉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文化自觉是对文化的“过去”和“现状”的反思,是对文化未来走向的设计和实践,文化自觉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第二,多元文化在特定空间内的并存与互动是文化自觉的重要条件。文化自觉作为对“我文化”的反思,是在多元文化并存与互动的情景中展开的,并以“他文化”为参照。第三,文化自觉是多层面的,如族群层面上的(回族的文化自觉)、民族集团层面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国家层面上的(如美国的文化自觉)以及全人类意义上的文化自觉等。第四,文化自觉的主体一般是人文领域的知识精英。第五,文化自觉引领文化变迁,带动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变迁。某种文化的发展走向、人们的文化策略以及社会变迁的取向等取决于该民族文化自觉的信度(可靠和理性程度)和深度(认识所达到的层次)。

二、回族历史上的三次文化自觉

回族历史上出现过三次文化自觉。第一次发生于明朝中后期,主题是经堂教育制度的创建,以胡登洲为代表;第二次发生于明末清初,主题是汉文译著和“回儒对话”,以

^①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98-399页。

王岱舆、刘智、张中、马注等为代表；第三次文化自觉发生于清末至民国时期，主题是改良宗教、发展教育、救国图存，其推动者是由回族宗教界人士和世俗知识分子组成的更大规模的精英团队。

（一）第一次文化自觉：经堂教育制度的创建

随着从元到明的社会历史演进，回族共同体逐渐形成。众所周知，回族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作为认同的纽带，以汉语作为族群内部沟通思想和交流感情的媒介。但早期的伊斯兰教经典主要是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表述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让使用汉语的穆斯林民众知晓伊斯兰教教义？回族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自觉所要思考和解答的主要是这个问题。

回族历史上第一次文化自觉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经堂教育的兴起。用今天的眼光看，经堂教育制度已显陈旧，但在500年前，它却是充满活力的新生事物。经堂教育的兴起是以胡登洲为代表的回族知识分子在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具有很强主体性、先导性的文化危机意识、文化创新精神和文化实践理性。胡登洲创设经堂教育的目的是改变回族群体中“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现状，但其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宗教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经堂教育为回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绵延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阅读历史文献可知，胡登洲生活的时代正是回族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回族社会存在以下几个现象：第一，明朝初期推行族群同化政策，在婚姻上“不许本类自相嫁娶”，提倡少数民族用汉姓、着汉服，处在形成过程中的回族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第二，回族先民群体中族源背景不同的个体成员逐渐放弃各自的母语而开始使用汉语，汉语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要想使伊斯兰思想为广大回族民众所了解，阿訇必须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经典翻译成汉语向人们讲解。第三，回族社会成员大多接受与汉族成员相同的儒家文化教育，而在伊斯兰文化方面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

胡登洲阿訇顺应回族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转型趋势而创建的经堂教育是一种建立在语言学习基础上的宗教认知实践，经堂教育通过培养和造就为广大回族穆斯林宣讲伊斯兰教教义、提供宗教生活指导的专门人才，强化了伊斯兰教对这个汉语穆斯林群体社会生活的影响，促进了回族穆斯林的文化整合，及时弥补了回族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断裂

现象。经堂教育兴起以前,“中国伊斯兰教阿訇,多由阿拉伯、波斯、中亚伊斯兰学者担任”。^① 经堂教育建立后,逐渐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本土伊斯兰教学者,从而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世代绵延奠定了基础。经堂教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回回民族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自觉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

(二)第二次文化自觉:汉文译著与“以儒诠经”活动的开展

回族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自觉就是明末清初兴起的汉文译著和“以儒诠经”活动。在胡登洲创建经堂教育之前,已经有回族知识分子开始了“以儒诠经”的尝试。例如,出身于伊斯兰世家的山东济南人陈思曾撰有《来复铭》一文,在宇宙观、认识论和人性论等方面融会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学说,并以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结构和观点阐述伊斯兰教教义。^② 陈思的《来复铭》成文于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早于胡登洲创办经堂教育约半个世纪,早于王岱舆、张中、刘智等思想家的汉文译著活动近一个世纪。可见,陈思也是回族文化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先觉者。另外,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回族人物志》(明代卷)中对较胡登洲稍晚时期的两位回族知识分子在“以儒诠经”方面的尝试给予了关注,这两人一个是张忻,另一个是詹应鹏。张忻和詹应鹏都是明代回回仕宦人物,进士出身,对汉文化和伊斯兰教义均有造诣。张忻曾撰写《清真教考序》一文,从哲学角度认识伊斯兰教,以儒道文化中的太极学说会通伊斯兰教真主本体论,成为“汉克塔布”(汉文伊斯兰教译著)的哲学基础。詹应鹏辑有《群书汇辑释疑》一书,他在该书的跋文中校正了教外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误读,并用儒家思想解释伊斯兰教,对程朱理学与伊斯兰教教义进行了调和。^③ 学术界一般将王岱舆、张中、马注、刘智等伊斯兰学者视为汉文译著和“以儒诠经”活动的倡导者,但从以上记述看,回族历史上第二次文化自觉的时间还可以上推。

第二次文化自觉的出现与经堂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经堂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伊斯兰学者,为后来的汉文译著和“以儒诠经”活动奠定了人才基础;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堂教育的局限性也日渐显现,从而激发了后辈回族伊斯兰学者自我反省和自我超越的勇气。经堂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回儒对话”的一种方

① 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33页。

② 冯今源:《〈来复铭〉析》,《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③ 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18-125页。

式——经堂教育中的“讲经”就是要将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口头翻译成汉语。但相对而言,经堂教育更重视“习经”,轻视经生的汉文基础,这种求知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阿訇深入理解经典和正确讲解经典的能力。从社会环境看,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封闭性致使教外民众很难理解其堂奥,甚至对穆斯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存在种种误解,很多关注伊斯兰教的人还提出了一些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同时,穆斯林中的读书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不懂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但想了解伊斯兰教教义。于是,关于阐述伊斯兰教教义的汉文著作和翻译就成为必要的了。^①

回族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自觉是大规模的文化反思和伊斯兰文化自我创新活动,其参与者是一个由较多数量的回族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群体,王岱舆、刘智、张中、伍遵契、马注、常志美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其基本形式是汉文译著,即用汉文撰写和表述伊斯兰教思想。在汉文译著活动中,回族译著家借用儒释道文化系统中的一些概念和术语译解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阐释伊斯兰教教理,从而增强了伊斯兰教在汉语语境中的表述能力。在跨文化比较视野中对儒家文化体系中“天人性命”学说、“三纲五常”学说等所进行的改造和适度吸收,丰富和发展了回族伊斯兰思想文化体系,显示了伊斯兰文化的包容性。

总之,汉文译著和“以儒诠经”活动,实现了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提升了伊斯兰文化的生存能力,在回族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第三次文化自觉: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回族历史上的第三次文化自觉是20世纪初叶兴起的回族穆斯林新文化运动,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的日益没落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革新意识和救亡图存精神。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维新变法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努力失败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经历了清朝时期深重的民族压迫后,回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严重倒退,受中

^① 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34页。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清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4页。

国近代社会变革思潮和文化自觉大环境的影响,回族社会中的先觉者迅速掀起了回族穆斯林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族穆斯林新文化运动是由一批献身于民族与宗教事业,热爱国家,热心教育,主张改革的知名学者和阿訇倡导并付诸实践的,其主题是兴族救国。在振兴本民族方面,回族中的优秀分子明确提出了改良宗教、发展新式教育的主张并付诸实践。自1906年童琮在镇江创办穆原学校以后,多层次、不同规模的新式学校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这些新式学校的显著特点是注重“中阿并授”,在以培养宗教人才为主的学校里,除讲授阿拉伯文、伊斯兰教典籍外,还增加了汉语、国学、历史、地理、算术等课程;在培养社会公共人才的普通学校里,主要开设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几何、代数、绘画等课程,适当加授阿拉伯语等课程。新式教育通过改革课程设置将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相结合,改变了经堂教育重经学轻汉学的传统,也开了学校教育加授阿拉伯语、宗教知识等课程的先例,从而有效弥合了回族历史上存在的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相脱节的现象。

在创办新式学校的同时,回族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还致力于学术研究和社团建设。这一时期,回族民间或社团创办各种回族文化学术刊物多达40余种。这些刊物关注民生,刊载了大量反映回族社会生存状况的实地调查报告和阐释伊斯兰教义、学说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和寻求民族自我发展的主体意识。在学术研究方面,《古兰经》的汉译活动一时蔚然成风;一批在国内外接受过现代教育和专业学术训练的回族知识分子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回族伊斯兰历史文化研究,如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等。同时,一些具有现代特征的回族伊斯兰文化传播机构逐渐兴起,如北平清真书报社、上海中国回教书局、成都经书流通处、云南振兴社等。

建立宗教或学术社团也是近代回族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的亲疏取决于血缘关系的远近,费孝通教授把这种社会关系结构称为“差序格局”。用现代学术话语说,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国家政权和家族社会组合起来的二元结构,以社团组织为表征的“公共领域”发育迟缓。传统回族社会的结构虽然在家族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组织结构,但同样不存在介于国家政权和家族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自1911年王浩然在北

平发起组织“中国回教促进会”以后,全国各地组建全国性、地方性回族伊斯兰社会团体十多个。这些社团组织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回族社会内部的联系,同时也成为密切国家政权与回族地方社会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在整合回族社会资源、反映民意、争取民族生存发展权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代回族伊斯兰社团组织的建立可以视为回族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象征之一。

近代回族文化自觉的另一主题就是救国。回族在传统上把以汉族为核心建立的统一的国家政权视为正统,遵循和奉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这种国家观念主要与回汉民族长期交错居住、密切交往的族际关系和儒家文化对回族的长期熏陶有关。清代以来,深重的民族压迫使回族人民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回族人在社会生活中趋于内敛和自守。但随着列强的入侵和国家的半殖民化,这种生存策略受到严峻挑战,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当国家危亡时族何以为存?

在国内外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优秀的回族知识分子表现出空前的文化自觉,在广大回族人民中发出了“救国兴族”的呼喊。一时间,革命、救国等思想成为回族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创办新式教育、学术刊物,组建社会团体,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宗旨。1908年,在日本留学的36名回族青年学生编辑出版了著名的《醒回篇》,他们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号召回族人民“专其心力”挽救危局、改良宗教、发展教育。这些回族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推动了广大回族民众的文化自觉,使回族人民的传统国家观念有了新的发展。从辛亥革命经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回族人民逐渐站在了反敌爱国斗争的前列,表现出刚健奋勇、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20世纪40年代,著名文学家老舍和剧作家宋之的先生曾以回汉民族团结抗战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一部名为《国家至上》(又名《回教三杰》)的著名话剧,这是对回族人民新型国家观念的贴切概括。

三、当代回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一)基于三次文化自觉的思考

回族的文化自觉一般出现在整体社会格局出现某种变动或本民族社会文化趋于衰落的时期。每当面临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或回族社会文化出现某种危机时,人们一般会

意识到这种危机,并表现出积极的反思意识、批判意识,探索摆脱危机、推动变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策略。

历代回族知识精英是推动回族社会文化进步的先导力量。历史上的回族知识精英一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宗教型知识精英;第二种是世俗型知识精英;第三种是复合型知识精英。宗教型知识精英植根于回族民间社会,同回族民众保持着密切关系;世俗型知识精英置身于士绅社会结构之中,同回族民众的联系不够密切。宗教型知识精英宗教学识渊博,世俗型知识精英大多接受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从胡登洲到王岱舆、刘智、张中、马注等,这些回族知识精英介于宗教型知识精英和世俗型知识精英之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回而兼儒”——既有伊斯兰文化的功底,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造诣,笔者不妨把他们称为复合型知识精英。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历代开回族社会文化革新风气之先者一般是那些复合型知识精英。同时,近代回族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答案:宗教型知识精英和世俗型知识精英的互动与配合也可以推动回族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发展。

历史上的三次文化自觉所引领的回族社会文化变迁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过程。明清时期,回族将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熔为一炉;近代以来,回族同样能够抱着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科技文化,从而使民族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结构不断优化,生命力不断增强,回族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

每次文化自觉、文化革新的主题虽然不尽相同,但教育(经堂教育与世俗教育的关系问题)和宗教(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历次回族文化自觉的共同关切。经堂教育、汉文译著活动和近代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留给后人如此深刻的追忆,就是因为每一次文化革新都能够成功解决回族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面临的教育难题和宗教困境。

(二)当代回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从20世纪初叶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兴起至今整整一个世纪了,在这100年里,回族人民与各民族兄弟一道反帝反封建、抗战救国,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取得了平等地位,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